

# 往事

——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

第五十九期 二零零七年七月六日

**编者的话：**本文叙述的是革命队伍中一类特殊女性的命运——随权力沉浮。

权力与性，历来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。从原始丛林的体能优势，到人类社会的权力法则，性作为生存资源，长期是被争夺、被占有的目标之一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帝王们的三宫六院自不待言，造反农民的行径亦如出一辙。阿Q的革命理想就包括吴妈和小尼姑。

性是资源，既可以享受，也可以配置。从战争年代起，由组织安排革命伴侣就是婚姻形式之一。新政权建立后，各种资源“收归国有”，一元化之下，人们的恋爱、结婚和生育都受到干预，个人生活空间日益狭小。性表象也开始从社会生活和主流话语中消失，除了在医学和实用的范围，有关性的一切都被斥为“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”。于是，性成为稀缺资源，成为禁忌。社会生活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酷的禁欲时代。

另一方面，在权力金字塔的上层直至顶端，性开放作为特权被某些人充分享受，所谓“大干部小问题，小干部大问题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出现了政治垄断、经济垄断、文化垄断之外的性垄断。作为一个声称消灭了剥削阶级及其特权的制度，作为一个声称具有无产阶级道德的革命家群体，对此却无法自圆其说。

索性不说。

在某一个层面，这是公开的秘密，但对于全社会，则完全难以想象。造成这一现象的，除了不遗余力的神化宣传，还有法国学者福柯所说的“全景监狱效应”：最高处的监视者对监狱中的情形一览无余，而底层的囚徒除了能感受到那无所不在的目光之外，对最高处的情形一无所知。

直到文革时期，一些人沦为“走资派”，人们才从揭发的大字报上看到了冰山一角。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真相不断披露，人们发现，在那个中国历史上“道德最纯正”的时期，围绕着完美如神的无产阶级领袖及其属下，传出的事情却恍若脏唐臭汉。

人们在嗟叹、同情这类故事中沦为权力玩物和附庸的女性的同时，实在还应该关注她们的内心世界：“革命教育”怎么使她们“献身献心”到如此地步？她们感受的是屈辱，还是荣耀？她们如何面对那巨大的道德反差……

也许，就个人境遇而言，本文中的三妹还算是“幸运”的。在同类故事中，不知隐藏着多少悲惨的结局。

## 红色佳人泪

——记李氏姐妹

卢弘

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，有两位李姓姐妹。她们家共有姐弟五、六人，与我相熟的主要

是与二姐、三妹和一个兄弟，因为他们三个都是（或曾是）我的文艺战友，其余几位我也认识，只是交往相对少些。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，他们的母亲是一位革命烈士，这姐、弟、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，因此也与我结下了友谊，并且是不太一般的关系。

## 二姐和我们军长及其家事

先说二姐。

我与她相识最早，那是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之后，部队转移到苏北地区，华中军区文工团与我们新四军一师文工团到了一起，我们团请军区文工团一位女同志来辅导秧歌，来的就是二姐。我当时才是个十四、五岁的小鬼，竟被她罕有的美丽吸引了。她扭的秧歌更令人叫绝，我至今还记得甚至会学她那特有的舞姿：用脚尖点地并使全身轻颤着，两眼随着双手“飘”向四方……简直令人神魂颠倒！显然因为她的品貌出众，不久就被一位首长“占有”，成了他的妻子。几十年后，我的另一位文艺战友，在我家遇到二姐的儿子，竟当我的面对她儿子道：你妈是先被你爸强奸了，然后才跟他结婚的，也才有了你们。此说是否有据，我难以考证，却知这位首长在此之前已结过婚，不知是因为“感情不和”，还是由于有了她这“新欢”，又离了婚并再结婚。我再见到她时，那位首长已调任我们军长，她就成了我们的军长夫人。

这时我已长大，对于她的美仍是惊叹不已。她的丈夫即我们军长，平时与我们这些“小兵腊子”有点没大没小，常在一起说笑，并且对我似乎格外关顾。1955年我借调到总政工作时，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，军长正在北京，我去请示，他对我全力支持。进了美院之后，他竟亲自来学校看我，来时没带警卫员，又穿着便服，被门房老头拦住填会客条，他不知怎么填，被训了几句。他见到我时笑道：你们学校门口那老头比我还厉害。我送他出门时问门房：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我们军长，一个真正的将军，你却把他给教训了！那老头这才歉意地说：对不起，我眼拙，没看出是位将军。也难怪，填会客条是卫士和秘书的事，您哪会呢？要是你穿军衣带肩章来，学校就会敞开大门欢迎视察了。

我在总政工作时，无意中搅进了军长夫妇间的一次内部矛盾。二姐作为军长夫人与我重逢，因为我认识一些部队作家、艺术家，她托我打听一位已是作家的战友地址，我很快完成任务告诉了她。当时我不知道，她与这位战友，抗战期间曾同在新四军四师“拂晓剧团”，并且是一对恋人，可是她的美，战友喜欢首长也喜欢，她那战友“胳膊扭不过大腿”，她只得被迫痛别恋人。成了首长的老婆，却又对老情人，一直心怀愧疚又念念不忘，终于通过我重新搭上了关系。他们当时都在北京，据说曾多次约会过。这事被军长发现，两人吵了一架，幸亏二姐没有“咬”出我来，不然我肯定逃不过军长大人之手。她后来告诉我这事时，说自己也曾对其丈夫反唇相讥，原来军长也曾多次与前妻重逢约会，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妻子不忠，例如她有一次偶然临时回家竟进不了门，好容易打开，看到她丈夫和一女文工团员在里头，惊慌不安又衣衫不整，他们肯定没干好事，因此她也有权对其丈夫进行“报复”。

## 军长夫妇对我的美意

二姐和军长吵归吵，有一点他们却完全一致，即要把她三妹介绍给我。

三妹原是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，这时正住在自己姐姐、姐夫家。这位三妹美貌虽不如二姐，却正处青春期并“待字闺中”。显然二姐想弥补自己未能与文艺战友结为一家之憾，因为我与三妹年龄相当似也般配，她那当军长的丈夫，又有些偏爱我这“多才多艺”、正上美院颇有前途的部下，两人一致主张让我与三妹结识交往，于是我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，并且每回都受到一番款待。有一次他们为我沏了杯好茶，军长问我这茶怎么样，我说还可以。

其实我只喝过大碗茶，根本不会品味。军长听了骂道，你这家伙口气不小，我这茶叶几十万元（旧币）一斤，你只说“可以”，真是白给你喝了！又有一次吃饭时，军长指着一道菜问我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说是粉条，他又笑着骂道，他妈的，我又白招待你了，这是鱼翅，谁家有这“粉条”啊？我只得也笑道，我是吃炊事班饭长大的，别说吃过，见都没见过这种美味，难怪它又鲜又好吃，可惜把它当“粉条”了。我们吃喝说笑时，三妹当然陪同在座。

当时三妹其实正闲居甚至困守在他们家。她是辞了原文工团的工作，到北京来报考苏联舞蹈家执教的“中央舞训班”的，由于竞争者太多，更由于三妹本来基础较差，特别是文化不高，自然被刷下了。她不好意思再回原单位，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干的姐姐、姐夫家，每天不免无聊和困顿。恰巧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人像写生，她们姐妹就成了我的最佳“模特儿”，不仅为她们一人画了一幅半身肖像，还根据她们已逝母亲的照片，另画了一幅油画像和一幅粉彩像，使这位烈士也“音容宛在”了。应该说她们的妈妈的确是一位美人，可惜姐妹几个只有二姐独得其母真传，美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大姐不必说了，这位三妹却是青出于蓝反而逊于蓝，仅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，整体及其气质大有差别，尤其是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，幸亏跳舞用不着出声，不然就露怯了。

当我知道军长夫妇对我的这番美意后，一面不免“受宠若惊”，一面又感到迟疑甚至为难。因为这位三妹有时并不可爱，且不说其文化修养不足，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，尤其是倚仗其姐夫、姐姐的“高干亲属”的派头，与我这平民出身的“小兵腊子”，常常很不合拍。但我没有也不能拂军长夫妇的好意，还是甘愿甚至乐意与她们不断交往，说穿了是因为二姐太美，与三妹也多少有点“情分”，就常去看望她们，陪三妹聊聊天，看看演出和展览，暂时充当了她的“候补情人”。后来她由军里的陈政委通过老上级、老战友的关系，调去了铁道兵文工团，使她终于又有了“归宿”单位，二姐和姐夫家又迁出北京，我和她失去了见面地点，离开美院上班后，就减少甚至中止了与她的交往。若干年后，我有了自己的爱人，这段“情缘”宣告完全结束。

但是我们之间的故事却没有完。

其实我与三妹也是老相识了。早在1948年春，我们部队正在黄河北面休整，著名的“新旅歌舞团”来慰问演出，我们文工团派我和几个同志去他们那学习，我主要学画幻灯片，同时也学学打腰鼓和一些歌舞节目。我们在“新旅”呆了一、两个月，与许多同志都熟悉了，常见一个很小的丫头，穿着齐膝的过大军衣，下面还打着松垮垮的绑腿，一头黄毛乱发上，撅着两根很少梳理的小辫，虽是单眼皮，肤色却特白，只是有时拖着两条鼻涕，在流过嘴唇时，或是使劲吸回，或是用袖口擦去，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总是油乎乎脏兮兮的。她很少上台演出，只是跟着团里行动，自己学着打打腰鼓什么的，由一些较大的女同志带着。后来知道，她和同在“新旅”的哥哥都是烈士子女，1945年就来到新四军，她当时才八、九岁，等于是“寄存”在部队文工团。几年以后在我们军长家又见到他们，才知与二姐原是一家，又知其兄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编导，主要作品有舞剧《宝莲灯》、《小刀会》等。我们都为在战争年代相识，现在又重逢而高兴。三妹后来也出息了，不只当了不小的“官”，更成了通天人物，最后竟与我共过一段事。但我和她相处时，总是忍不住揭她的“老底”，说她当年撅着黄毛小辫，拖着鼻涕的“光辉形象”。每次说此旧事，她都不答理我，似乎怨我毫不顾及她的面子和现在的身份。但是她当年的形象给我印象太深了，与她后来的尊容又反差极大，使我憋不住不提往事，虽然这可能惹她不大痛快。

三妹到铁道兵文工团后，我只在大型歌舞《东方红》中见过她，偶尔遇到也只打打招呼寒暄几句而已，这时我已有了妻子孩子，她却还是“单干户”。我知道她心气很高，不是门当户对的“白马王子”决不出阁。不料她后来的老公竟是我的一个“铁哥们”，他是我早已相识相熟的部队知名画家。当我得知他们二人正谈“恋爱”时，我曾警告“铁哥们”：那“小姑奶奶”可惹不起，你千万别找她！哪知他不听“老人”言，还是与“小姑奶奶”结了婚。

因为我曾企图破坏这门婚姻，他们的婚礼请了我，我却不敢去，怕成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。为他们牵线搭桥促成良缘的人我也认识，事成后得意地问我：这两口子真是门当户对，十分般配吧？我心想就等着瞧吧！没想到真被我料中了，在他们有了一儿一女后，竟打离婚彻底分手了。

这是后话，以后再说。

### 三妹闯“宫”享受恩宠

却说三妹在铁道兵文工团时，团里有项额外的特殊任务，即在周末到中南海去，给毛泽东、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伴舞。三妹原来就是部队文工团舞蹈队的，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干亲属，不仅业务熟练，政治尤为可靠，就常常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，结果为此不仅改写了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，还影响到了她周围的人，此事由来及后情如下。

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，其中就有三妹，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。她本来就会“来事”，如此天赐良机，当然乘机大显身手，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。由于她是单眼皮，已故“第一夫人”杨开慧也是单眼皮，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，杨的小名叫“霞姑”，伟大领袖就赐她御名“李霞”。在舞中闲聊时，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，你们都去哪儿玩哪？她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。老人家顺口道，到我这儿来嘛！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。中南海警卫室不让进，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。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，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，老人家想了想道，我是说过这话，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！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：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，老人家也重见了活生生的又一“霞姑”。就在他们一老一少相谈甚欢时，中南海警卫室一个电话打到铁道兵文工团，批评他们怎么没管好自己的团员，居然让她闯到伟大领袖身边来了。警卫室让文工团团长、政委马上赶到中南海来，准备等“私闯后宫”，已成为老人家身边“李霞”的团员出来时带回团去，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。

几个小时以后，也许“日理万机”正“为国操劳”的伟大领袖确实另有公务，三妹这才恋恋不舍地“退朝出宫”，由自己的团长、政委带了回去。不过团里谁也不敢怎么着她，因为她已有了“尚方宝剑”，说是毛主席让她以后随时可以再去，并且留了相互联系的办法。这使她从此享受了“圣上恩宠”，并且成为谁也惹不起的通“天”人物。不久以后，她就被调出铁道兵，“奉旨”安插到离老人家更近的北京卫戍区，又进了什么公安学校。据说老人家非常关心她，让她“脱产”学习特别是学外语，说要将她培养为贴身秘书，并且不论何时，老人家一旦想到她，她就得进“宫”伺候。老人家外地出巡时，她也得陪“驾”护“辇”，一时成了伟大领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，至于是“宠臣”还是“宠妃”就说不清了。

也就在此期间，即1965年秋，我那“铁哥们”画家，正出差在西藏，忽接北京急电，如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似的，命他迅即返京，接受重大任务。他一头雾水地赶回京城，却见已为他布置好了新房，立即“奉旨”与三妹完婚大吉，筹办喜事的全部用费，皆由伟大领袖处支付。为他们操持一应婚礼大事的，就是我的老友二姐，她表明是执行“最高指示”，奉命完成这一“重大任务”的。这使我那“铁哥们”画家，又惊又喜又难以置信，没做梦就娶上了媳妇。他们婚后，相继有了一儿一女，越长越大后竟没一个像爸。好在当爹的并不计较，当时也没DNA检查，也就由它去了。

到“文革”时期，三妹夫妇竟都成了名人，只是二人各走一极。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（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），经常出头露面，对下属的各个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等等，到处下命令作指示，还领着样板戏女演员随她进“宫”，参见人们梦寐以求的伟大领袖，既使她们亲耳聆听了凡人未闻的“最高指示”，又为当今“圣上”当面恭唱“堂会”折子戏，使女演员们获得了此生的最高荣誉。1967年7月25日，林

彪、江青等“左”派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广大革命群众，原是文工团员的三妹，竟手抱语录本，笑盈盈地站在“副统帅”和“伟大旗手”之间，简直也成了他们的“亲密战友”，不只豪气冲天，并且牛气逼人！只是这时她那老公，即我那“铁哥们”画家，不仅没有如此风光，反而成了所在单位掌权造反派的对立面和阶下囚，因为他的老婆能通“天”，遭到了夺权者的忌恨，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，就拿男的出气，使画家受了很多罪。在两派斗争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，不过是反面的，“坚决打倒”和“欢呼揪出”的大标语，刷到了天安门城墙上，比他作为画家的名气，可大得太多了。三妹有时运用权力和关系拉他一把，却又常常顾不上，由他被对立面批斗关押和刑讯逼供，吃了大苦头，与其夫人的地位待遇相比，成了一个入天堂，一个进地狱。他们夫妇自然也被革命“革”得时分时合，闹得家不像家，夫妻也不成夫妻了。

好在不论别人怎么折腾，三妹身后自有最大后台，使她“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”，照当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组长。可别小看这个“副组长”，其能量和威风却大得令人目炫，许多上层人物都拜倒在她的“石榴裙下”，新任国务院文化局副局长、曾与三妹同行的刘庆棠（也就是人称“长征两万五，不如跳个芭蕾舞”的舞蹈演员）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，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等，都是她家的常客，她家门前老是停着作为高级干部标志的红旗轿车。当军长的二姐夫对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来，时时来讨教和请示她这事那事……。

之所以如此，原因只有一条，即她能通“天”。全国八亿人口，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见伟大领袖的人之一。连她的住房，也是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，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，即现在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西侧“贵宾楼”的原址。不止如此，家里还安了部摇把电话机，那头直通中南海，老人家可以随时传唤，电话铃响后，红旗轿车就到门口，马上将她接进“宫”去。

可怜我那“铁哥们”画家，说是她老公，却成了她家男仆，吴德、吴忠和刘庆棠等一到，因为都是夫人的贵宾，他就得在一边递茶倒水伺候客人。夫人俨然是党国要人，老公只剩了喊“喳”应“喏”的份儿，他们家只有“母鸡”会“打鸣”了……

## 党和国家的“绝对机密”

前苏联有部关于彼得大帝故事片，其中一位大臣有个颇有姿色的使女，其实是他养的小情妇，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欢，却被使女迎面给了一耳光，原来她已被皇上“宠幸”过了，身份已由原来的使女变为未来的皇后了，那大臣只得将自己的小情妇拱手让给了彼得大帝。

三妹及其老公，似乎也是这样。三妹由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，突然成为权倾一时的高官，其原因只是她不仅成为伟大领袖身边的人，更已受到当今“皇上”的“恩宠”，身份地位已是“宠妃”，自然不再同日而语了。不过此事绝对不能乱说，不止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隐私，更事关伟大领袖的“光辉形象”，追究起来罪责难逃。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，我不仅逐渐得知一些真情实况，又已有书为证。

“文革”以后若干年，国内秘传一部禁书，即在境外出版的“毛泽东私人医生”李志绥的回忆录。有回二姐的儿子来我家，说到此书时，他说已看过，并且不无炫耀地说，那书里写了我三姨，连我妈都写进去了。后来我终于找到此书，读后发现其中果然多处写到三妹，也写到了二姐。原来三妹自从进“宫”，被老人家钦定她像杨开慧后，真的继承了“烈士遗志”，并且代行了“第一夫人”职责，不断被伟大领袖“宠幸”。她发现老人家虽然“日理万机”，却又有此一好，就以身相许，努力为其服务，更为求其欢心，再引进别人，好让他换换口味。她陪“驾”伴“君”到上海时，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（也是一位舞蹈家）领来朝拜“圣上”，哪知“龙心”不为所动，因为她嫂子虽也有几分姿色，却没有被老人家看中，

当天就打发走了。后来她又跟老人家到了无锡，当时仍当军长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无锡，她就领着一起来参拜“皇上”。这时二姐虽然已近中年，却仍姿色出众，尤其是那雍容华贵的气质，老人家一见立即龙心大悦，先留他们夫妇二人共进晚餐（三妹自然作陪），饭后却让军长自己先回去，将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，使其也享受了几天“龙恩”。二人共享“皇上”恩泽，凡人哪有这等福气呢？当时正随“驾”的汪东兴和李志绥指着三妹悄悄说，她妈妈要在的话，她也会领来孝敬“皇上”的。书中又写到，李志绥医生发现伟大领袖沾上了“滴虫病”，这是从别的有此病的女姓处得的，但对男性无妨，只是又会将病菌传给下一个。后来我知道，病就是三妹“献”给伟大领袖的，因为我那“铁哥们”画家，也沾过三妹这光。

我记得三妹后来对我说过一段绝密的“最高指示”，即老人家认为现在婚姻制度并不好，应该实行一种“合同制”，即男女有意后，只订一年的“合同”，第二年还有意就再续一年，反之则拉倒，免得离婚吵架惹麻烦。看来伟大领袖已在“试行”自己的“理想”了，不过他连“合同”也没订，即使有，一年也不止订一份，他在这方面确已切实实践并达到了“自由王国”。

李志绥的回忆录，虽然在境外公开发行为广为流传，在我国大陆却是“党和国家绝对机密”，严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传播，但是其中写到三妹的事，却由我那“铁哥们”画家证实了。他说自己在“文革”中因为受迫害，关押揪斗又上过刑，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，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不听使唤，气得她骂道：你都不如个七、八十岁老头子！正是此事，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“种子”。我得知此事后对“铁哥们”说，你老兄也够“幸福”了，居然与伟大领袖“共饮一江水”，他恼火得把头上的军帽一摔道，我这顶“绿帽子”算是戴定了！不过这话是在“文革”结束多年后才说的，当年我还未见上述那部“医生回忆录”，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，已是“圣上宠妃”（严格地说应是“之一”，因为“宫”中“宠妃”不止她一个）。

在“文革”后期，我为了“躲风”，借口学习领会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去红军长征路线访问写生，正赶上“铁哥们”和三妹闹离婚，因为我与他们二人都有多年友谊，又不知他们要离的主要原因，曾劝他们“和为贵”。由于离婚是三妹提出的，我又特地去拜访了大姐，让她也帮助劝三妹。大姐却小声对我说，你不知道，他那东西不行了，夫妻生活没法过，再加上别的事，是非离不可了。我想这其实是种病，只要治好，就可以不离婚了。但是当时他们正剑拔弩张地较着劲，“铁哥们”的病也不能马上治好，不如暂避锋芒，先退避三舍，让他和我一起到长征路线写生去，他欣然答应，马上与我同去“长征”了。我们在贵州和云南等地转了三个来月，我因为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，他却又去了西双版纳，住进傣族村寨深入生活。哪知三妹正急着要和他离婚，等他回来办手续，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人。三妹着急，她的大姐、二姐也跟着着急，她们知道人是我领着“逃跑”的，对我非常生气。

当时我不知道，三妹急于离婚，是想再嫁一个大官。原来有位年纪不老的政治局委员，刚刚死了妻子，正虚席以待，三妹就想改嫁那位政治局委员，以使夫妇二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倘佯，不似这个画家老公，只配在家里为她及其贵宾端茶倒水。可是画家却被我拉走并且抓不回来，这使二姐、三妹对我都很恼火。

### 三妹主动“泄密”炫耀

就在我与“铁哥们”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，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“皇上宠妃”的事。1965年三妹所以急如失火地与他结婚，也是由于“最高指示”，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已怀上了“龙种”，但她却是个未婚“处女”，如不结婚就会露“馅”。三妹失节事小，领袖形象事大，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，以使其腹中“龙种”有人认领，好代伟大领袖当个“替罪羊”，这才有了“十二道金牌”将他从西藏紧急召回，不由分说先入洞房，当了个

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涂新郎。也是在这期间，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“都不如个七、八十岁老头子”等等床上秘闻。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，如三妹不只同“圣上”有染，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，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。有回司令带三妹夫妇一起乘车去什么地方，让当老公的坐在前排司机边上，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，那老公从后视镜中看到，自己的老婆正被司令又搂又摸又亲着，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敢发作。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，并声称自己这是“助人为乐”，又说自己的老婆在家闲着，谁想去去就是了，只要她乐意，他却不在乎，互不干涉就行。

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，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，当即表示，他应立即离婚，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。常言道“伴君如伴虎”，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借口搞掉了，不论是“圣上”还是“司令”，会像捻死一只蚂蚁似的灭掉你，死了也不知是咋死的，更是白白死掉。“铁哥们”后来果然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。只是已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，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，已经另有新欢，等三妹办妥离婚，黄瓜菜都凉了，已高攀不成了！

他们离婚以前，“铁哥们”有次苦恼地对我说，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“战场”，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，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，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同一个首长千金，这第三对的“战场”就在他的画室里，他回家来见每个床上都被衾狼藉，他只得忍气吞声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。二姐到北京来，知道此事后骂道，这南河沿124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！

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，涉及我朋友的隐私，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“光辉形象”，应属党和国家的“绝对机密”，所以我和“铁哥们”一直为此严格保密着。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，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丑，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，并且不无得意之色。这也难怪，中华八亿同胞，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，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，算是二亿，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，有几人有此“幸福”，亲身享受、也给“圣上”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“亲密接触”？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，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“绝对机密”。

遗憾的是，1976年9月9日“吾皇驾崩”，停灵于人民大会堂，接受人们瞻仰 遗容和沉痛悼念。这时三妹赶去，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，放声痛哭道：你不能走啊，主席！你不在了，叫我怎么活啊！……据说“第一夫人”江青闻讯大发雷霆：这个李××，胆大包天，居然大闹人民大会堂，看我怎么收拾她！可喜的是，当年10月6日，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江青成为阶下囚，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，这才使三妹逃过一劫，不然落到那“红色女主”手里，很可能同汉高祖的戚夫人一样，被打入死牢，还砍去胳膊和双腿，更“去眼，焯耳，饮瘡药，使居厕中，命曰‘人彘’。”三妹幸免“人彘”之难，所以她和我们一样，都欢庆“四人帮”的垮台，为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。

## 极其珍贵的国宝级革命文物

前已说过，三妹总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不久，中央决定建立“毛主席纪念堂”，并在全国征集关于毛主席的文物，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、诗词、书信等等手迹，都必须上交中央入档，不得流散在民间和个人手中。见此中央通令后，三妹找我去，让我看了她藏着的一批领袖文物。此前我已在她那儿见过几件，这次让我全部一一过目了，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：她手头竟拥有大批价值连城的特级文物似的国家珍宝！

这些宝贝平时锁在一个小皮箱中，那里面全是伟大领袖的亲笔墨宝，其中不少是特地题赠给她的。例如有一幅名词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，现在国内发表并流传的，其实并不是老

人家专门题写的，是从他给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，不仅没有前言小引之类，词中也有笔误和修改处。但三妹的这一帧，却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纸上精心题写的，前有关于此词的“小引”，后有御笔亲书的“跋”和“题赠李霞同志”一行大字。前文已写到，“李霞”是伟大领袖为三妹起的“御名”，将怀念“霞姑”（即杨开慧）的词，书赠给“李霞”，其意义自然深远，词后老人家那龙飞凤舞的狂草署名，更是令人惊叹。整幅诗词手迹的笔下功夫，不只是老人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巅峰之作，在当今“书坛”上也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无价珍宝。我欣赏后对三妹说，仅这一幅字，你下半辈子就是什么也不干，也吃喝不愁了。她得意地说，你再看，我这还有呢。接着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诗词手迹手稿，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书的，有的是古诗或名词的重新题写，还有一些题字题词，有几件是“向雷锋学习”和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等不同题字。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家给三妹的一批亲笔私人信件，有的是在八开白纸上用铅笔写的（这是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时专用的），有一信竟长达五、六页，其中对“李霞”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谆谆教诲，如嘱她好好学习，戒骄戒躁等等，有几处对她的批评，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，看来伟大领袖对她似已动了真情，并且是用了真心的。我一面欣赏这批文物，一面止不住为三妹惊叹，为她骄傲更为她担心，她个人私藏着这批特级文物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一颗颗“定时炸弹”，它太珍贵也太危险了，她不能就这么留在身边！

三妹说让我看这批文物，就是为了商讨一个处理的办法。这时她已与画家离婚，身边暂无别的亲人，所以临时召唤我来商量如此大事。我一面为她对我的信任而感动，一面为见到这批文物而高兴，就说按照中央规定，这些文物应当上交，但这是毛主席写给你个人的，上交后自己就没有了，这很可惜。她说自己正是这么想的，但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我想了想道，最好能复制一套下来，上交一份，自己保存一份。她说到哪儿复制呢？最好能“拷贝”下来一点不走样。我想到我的老上级华楠，这时正任总政秘书长，手下肯定有新型的文件复制设备（那时还不知道那叫复印机），我说可以去找他商量，请他帮助复制一套。三妹说也好，你替我去找找他看。我受命去见了华秘书长，他思考后说，这批需要复制的东西，应该先全部拿给他看看，然后决定是否复制和怎样复制。我回去告诉了三妹，她皱起眉头道，都让他看了，不就又扩散了吗？加上复制的人，还保得了密吗？她踌躇一阵后说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让更多人看了，还是等等再说吧。于是这批关于伟大领袖的国家特级文物，一直还在三妹手中。到她去世以后，就留下了一个“国宝悬案”。

## 三妹再婚

三妹与我那“铁哥们”离婚后，搬进了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一套住房（她就是在那儿向我展示这批文物的）。由于当时我正中年丧妻，她又已离了婚，并且二姐夫妇早有撮合我们之意，加之我们多年的交往，如今她又对我很信任，有好事者就鼓动我再与她好。我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不予考虑，心想就算她没有后来那些事，与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等都没有关系，这个“小姑奶奶”我还是不敢惹，并且她一直是“头上没有帽沿——眼睛朝上看”，当初“铁哥们”不听我的警告，与她结了婚都有了儿女，却落得个鸡飞蛋打离婚散伙的严重后果，这都是不听“老人”言的结果。我便对怂恿者说，她哪能瞧得上我，我还是找个能安生过日子的人吧。不过虽然如此，我和三妹还是友谊长存并交往不断。我又了解到，她在她家同她哥干那事的那位首长千金，一起商讨如何重新安排她们的终身大事，把各自原来的老公给“休”了，相约各找一个能“屁股冒烟”的，即有专用小车的大干部，好补过一把当首长夫人的瘾。

就在这时，有位超龄“白马王子”闯上门来，不过此公当时“屁股”并不“冒烟”，只是曾经而且仍将“冒烟”，有着相当的保险系数和发展前途。据三妹后来说，这位是拼命追



求她来的。此人我也早就认识，上世纪 50 年代，他是总政宣传部长，全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，后来随谭政主任一起下了台，到“文革”中又错投到林彪麾下，一度成为“副统帅”的智囊和笔杆子之一，哪知林彪又倒了台，被审查了一阵后，上面认为他陷得不算太深，解放出来正等待重新分配工作。此前他已丧妻，听说三妹正找对象，忙来报名应征。这时三妹也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已届中年却身边无夫，当这位前任部长将军对她猛攻穷追时，只得盘算衡量予以考虑了。她又与大姐、二姐再三商讨斟酌后，认为此公虽然暂时落魄，但是仍然大有可为，其资历和原级别都明摆着，必可东山再起，并且他虽比三妹年长 20 多岁，却比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年轻多了，也就没有拒绝。这位前将军部长为了追她，不惜抛弃架子和斯文，不断到三妹家来，烧菜做饭忙家务，殷勤伺候这位“娘娘”。在他软磨硬泡之后，果然称其心愿，成了三妹的虽不完全满意，却也门当户对的又一“郎君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之所以猛追三妹，其中有个重要缘由，原来他发现三妹“朝中有人”，与中央及军委若干领导人都较熟悉，和她结合将取得一条直通上层的捷径。三妹确也不负所望，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与魅力，保举这位郎君终于又升了上去，重新成为军中一位高级干部，并且享有了中将军衔。由于我和三妹的友谊，这位前部长大人，竟也成了我的朋友。

### 新任老公不准“泄密”

三妹手上那批“特级文物”，常常“烧”得她不大安生。

有一次，她又把我找去，看了一份毛主席谈话笔记。这是老人家几次关于文艺的谈话，她听后回来马上追记下来的，其中特别是关于京剧的一部分，不仅都是闻所未闻的，并且看出老人家对此确是情有独钟，对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，堪称内行，对京剧的改革发展，有许多独到的见解。我看后对她说，这些谈话如果整理公开发表，必将引起各方注意，甚至可能引起轰动。她说自己也这么看，所以找我商量怎么拿出来。我考虑后说，整理发表当然很好，不过据我所知，凡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讲话或文章，个人都无权随便拿出来，也没有哪家敢擅自发表，都应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“毛选”编委会统一处理，到了他们那里，怎么发、何时发和发不发，就由不得自己了，反正不会允许个人发表这类文章，说不定还会引起别的什么问题，看来这事比较复杂甚至麻烦。三妹所以想发表这些谈话，只是企图借此宣扬和突出自己，显示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，表明她如何领会并掌握了毛泽东文艺思想，已经深得其“精髓”，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势的筹码，大出一番风头，但是看来难以如愿，闹不好会事与愿违，出别的事。她皱着眉头想了又想，泄气地说，那就算了吧。我也遗憾地说，以后看情况再说。此事就此搁下。那批领袖谈话笔记，至今还在她那儿保着密，可惜又都成了遗物。

不过三妹欲借伟大领袖标榜自己之心一直未死，不久她又找我商谈一事。

我国每到逢三的年头，都要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字几十周年，掀起又一次学习雷锋的高潮。记得是在 1983 年，三妹又悄悄让我看了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迹墨宝，那是关于学习雷锋的不同题词。她说 1963 年《中国青年》杂志请伟大领袖为雷锋题词，她就在主席身边，那天老人家兴致很好，一边应约题词，一边对她说了不少对学习雷锋运动的看法，特别是对雷锋本人，以及关于如何宣传雷锋等问题，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。我听了感到十分新鲜和重要，认为应该整理出来发表。她说我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帮我整理吧。她又拿出几件不同的领袖题字，说配合文章同时发表。原来那天老人家题写时，一口气连写了好几幅，只选出一张给了《中国青年》，其余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，这些题字别说都拿出来，就是只发其中一件，也会引起轰动的。但我深知这位“小姑奶奶”的用心，不想被她拖进这类事中，就对她说，发表这类文章特别是主席题字，不能是个人行为，最好有个宣传单位出面，由组织和领导来处理此事，例如让报刊记者来访问你，你向他们介绍主席的谈话，再出示不同题字，这

就名正言顺并不由个人负责了。她说这样也好，又说你是《解放军报》的人，就由军报来访问我吧。我说回去找报社同志说说。一位军报名记者得知此事，大喜地说就由他去采访三妹。其实我是将此事推了出去，无意为她去张扬招摇和招惹是非，不料后来还是牵扯到我。

我为三妹办了此事后，正好去南京出差，老军长和二姐家就在南京，我去看望他们。哪知刚进门，突然有我的电话，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从北京给我打来的。

那位首长大人在电话中急乎乎又气乎乎地说，你怎么把三妹提供的毛主席关于雷锋的谈话和题字给捅出去了？我忙说自己并未参与这事，是军报记者听说有此谈话和题字，他们直接找了三妹，可能为此写了访问记，也可能准备发表，不过这是军报领导决定的，与我没有关系。那位首长严肃地说，这个访问记决不能发表，我坚决不同意发表此文。我说这事你得给军报领导说，跟我发火没有用。他又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等等，说是事关党和国家领袖，决不能这样随便马虎。我说反正这事与我无关，将其一推六二五，他只得把电话给挂了。

接此电话后，我一直纳闷，在宣传学雷锋时，发表这个谈话和题字，不是正好吗，为什么惹得那位首长如此恼火，要坚决反对和严格制止呢？我回北京以后问了三妹，她说他已经通过军报领导，将那记者写好的访问记，连原稿带清样，统统收走并且藏在自己的保险柜中，严令一字也不准外泄。我问三妹这是何苦呢？她苦笑着反问我，你说是为什么呢？我这才猛然惊觉，如果访问记发表，就等于将三妹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大白于天下，她那“宠妃”身份也从此公之于众，并且给那位首长在将军帽之外再补戴一顶“绿帽子”——他吃了伟大领袖的“剩饭”，以后还怎么当官和做人？所以他才气急败坏地严禁此文发表，并且坚决堵住包括我在内的可能泄露这一“机密”的各种渠道。只是这么一来，也堵住了三妹借此炫耀自己和扬名作秀的机会。好在我对此早有防范，估计到可能节外生枝，没有被三妹拖进此事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她的新任老公卡住了此事。幸亏我已脱身，不然我不仅将白费力气，更将得罪那位首长，使我“吃不了兜着走”！

## 大首长也官迷心窍

党的“十三大”前夕即1987年夏，三妹和她的新任老公突然对我格外关心起来。我住在军报院内一座6层楼上，他们夫妇二人竟爬楼来看我，使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。又有一次他们为我专程送来一些葡萄，说是刚从宣化带回的，送点给我品尝。我对此并未多往别处想，只以为是老首长看在我与三妹的老关系上，对我表示亲切关怀而已，哪知其中却大有文章。

有一回，这首长将我用专车接到他家，三妹那天不在家，家里也没有别人。我落坐品茶时，他就对我说开了自己的“过五关斩六将”，特别说到他和某某中央领导人原是平级战友，某军委领导还低于他，又表明自己对我军政治工作如何有建树、有创见、有雄心大志等等。当天和我共进午餐时，不仅菜肴丰盛并且规格颇高，简直像招待国宾，使我大过了一通嘴瘾，晚上又用专车把我送回家。在当时和回来后，我一直纳闷，他与我如此深谈并热情招待，到底为了什么？我只是一个小兵腊子，除了手里一支笔别无所长，他不会是要我为他写回忆录，因为他们单位和他自己手下，就有出色的笔杆子，用不着舍近求远地找我——怎么也想不透他为什么和我谈那番心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回又见到他，连忙向他招呼，他竟不搭理我，我以为他是首长，也许正考虑大事，就没往心里去。后来碰到三妹，我请她替我问候首长，她却说你还是离他远点儿，他对你十分不满。我说自己从未得罪过他，他的不满从何而来？三妹笑道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

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，那位首长所以对我“亲切关怀”和“热诚友好”，是为了巴结我！他官比我大得多得多，巴结我这小兵腊子干什么？原来此公用心良苦。当时我正为军委

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已逝夫人编文集和写传记，有时就在杨府上班，能够面见杨副主席。那位首长又获悉，我的老丈人伍修权正任“十三大”的“人事小组”成员，这个“组”虽“小”，声望影响却极大，负责对全国全党包括全军的高级干部进行审核物色，择优推荐为“十三大”的新中央领导班子，并为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，提出人大、政协特别是国务院和军委的领导名单。所以许多企图高升的上层人士都力图接近甚至打入这个“小组”。又有一小道消息说，我那老丈人将主持军委工作，这将直接影响到包括三妹她老公在内的一批军中高干。这位首长正梦寐以求地谋求总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的高位，他以为只要先买通了我，就既可以向杨尚昆递上话，更可以在我老丈人面前为他美言造势，由我几处给他打内堂做“托儿”，所以才对我“关爱有加”，不惜“礼贤下士”，又送葡萄又探望，又摆筵席又谈心，特别对我大吹自己的“丰功伟绩”。哪知我这人极不开窍，白吃白喝又白听了他的一番又一番美食美言，却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我在杨面前，除了文稿的事别的什么也没说过，我那老丈人回家，又绝口不提“人事小组”的事，我也根本不知有这么个“小组”，至于说他主持军委工作，更是决不可能，并且我若真有什么能量，自己不早早就爬上去了，何苦只去为别人说什么话，“为人作嫁衣”呢？所以那首长想求我办的事，我是什么忙也没帮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使他对我的期望，特别是他自己的升官美梦完全落空，直到“十三大”结束，也没分到半杯残羹，这才造成他对我的严重不满，因为我叫他“瞎子点灯白费蜡”了。

不过我弄清此事以后，对那位首长却由原来的敬重改为不屑了。他几十年前就是总政宣传部长，是个专门教育别人，指导全军、又专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干部，然而其人格竟如此低劣卑下，为了谋求高位，竟不顾体面又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。堂堂一个中将，居然拜倒也败倒在我这小兵腊子而前！以前他是借助三妹之力，不惜为她下厨忙家务，借与她结婚达到自己目的，实际是向她卖身，现在又向我卖笑！这种人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，并且是政工干部，不只是党的悲剧，更是军队的耻辱，党和军队怎么能用这种小人到台上去呼么喝六呢？

### 三妹面临又一次婚变

那位首长追求三妹，根本不是出于爱情（这种人心中可能从无所谓爱情），看中的首先是三妹在上层的门路多与关系深，正好为他服务，帮他升官。只是三妹哪是甘愿为别人效劳的人，她之所以与那首长结婚，也是以身作一赌注，预计他可能爬上去，后来虽然并未完全如愿，却也“屁股冒烟”，有专车了，三妹总算也当上了高干夫人。只是她这时官位也已不小，野心也更大，就在那第二任老公来巴结讨好我时，她自己也对我格外亲热。原来她也看中更看重了我正与杨尚昆家“亲密接触”，就向我掏出了她心中的“宏图大略”：这时她已是总参政治部的文化部长，正觊觎总政文化部长的高位，想使自己“更上一层楼”。她说最好我能和她一块干，她当上了总政文化部长，我可以当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，由我们两个把全军文艺工作管起来。我闻听此言心中一惊，却又未动声色，她有如此官瘾，我却不屑相陪，但是当时我正被总参二部、三部所吸引，很想去开发那里从未开发的创作“富矿”，并打算在总参创建一个创作室，就顺水推舟地去了参政。去后才发现我想的太简单了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的愿望难以实现，就不太积极了。在与三妹直接相处共事中，我发现她其实志大才疏，她的幻想也是空中楼阁，绝无实现的可能，并且她根本不是这块料。这些年她已不是当年的三妹，也已人老珠黄接近晚年了，本来我就无意与她合作，在参政呆了一阵，就悄悄退了下来。三妹本比我小，却比我早离休，55岁当年就下了台，她的官运也到此划上了不圆的句号，一生的追求、奋斗和拼搏，全都竹篮打水一场空！

就在三妹官场失利时，“后院”又起了火，她与新任老公之间，又发生了严重问题。我开始不知道，有回在电话中偶尔问起那位首长，她竟立即破口大骂那“老家伙”、“老混蛋”、

“老流氓”等等。前已说过，她那第二任老公，对她其实并无真情，由于三妹自有公务，不常回家住，有人就乘虚而入，为她老公送来了“温暖”，首长当然正中下怀。一来二去，三妹也风闻“第三者”插了足，有天她去那首长处，那个“第三者”知道她在家，又知道首长家电话连线，竟打电话来找那首长，明知三妹正在“窃听”，故意与法律上仍是三妹老公的首长说了许多肉麻情话气她，等于公开向她的夫人地位挑战。三妹是何等人，哪能咽下这口气！对我在电话中臭骂那女的是“骚狐狸”、“臭婊子”、“臭不要脸”等等后，又向我严正宣布，要坚决与“老家伙”离婚。她这一个电话打了至少一小时，也痛骂了那对“狗男女”一个多小时，听得我耳朵都木了，连握耳机的手都酸了，我只得劝她先消消气，不要着急，等见面再细说。也就从那时起，每次再见到三妹，她都只有一个话题，就是痛斥臭骂那“老流氓”、“臭婊子”和“狗男女”，并且是循环反复无穷重复，使我耳朵都听出了茧子，以致不敢再见到她。

三妹对其第二任老公，其实也无真情，他们这对夫妻只是在相互利用各下赌注而已。她对前任老公即我那“铁哥们”画家，倒是多少还有点旧情，加之共同抚养了一儿一女，总是有些“幸福的回忆”。他们离婚后儿子随父女儿随母，父母又随儿女经常一起会面重逢，这时不仅儿女高兴，两个大人也很愉快。由于我与他们的友谊，他们就带着儿女一齐到我家相聚，使我家成为这对离婚不断情的前任夫妇幽会之处。只是所有这些活动，都对三妹那新任老公严格保密。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那位首长还是侦知了三妹的不轨行为。后来他们打离婚时，这也成了男方告女方的一条罪状。

那位首长见三妹的利用价值已尽，特别是自己又有了新欢，加之三妹为此一闹，他们就打开了离婚战。这确是一场带打的“大战”，还是“你死我活”的“持久战”，三妹打得极其狼狈。男方毕竟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大首长，他很快掌握了“战争”的主动权，使三妹一直处于不利地位。在他的离婚起诉书中，反而抓住了女方一个把柄，除了说她与前夫经常私通幽会外，又说她在某年某月某日曾在家留宿了一个中年男性气功师，并且为此提供了人证，即那首长的秘书、公务员、炊事员等等，三妹反诉男方也有“第三者”时，却拿不出任何证据，男方因此总是占上风，气得三妹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。提到那个气功师，我也稍知一二，三妹和二姐有一段都迷上了气功。就在我上次去上南京二姐家时，一见她只觉面目一新，已大大减了肥，变得更年轻了，她说这是学气功的结果，还让我看了她练气功特别是其师傅发功时的照片和录相带。还真有点神奇，那气功师头上居然有闪亮的“圣光”，他用手一划拉，又留下一个如虹光圈，还在背景天幕上映现出他的“高大形象”。这位师傅就是三妹推荐给二姐的，三妹自己早已从他那儿学得了不少功夫，据说她在洛阳随师傅练“辟谷”，曾连续两、三个星期粒米不进，还照常活动。这位气功大师她不仅向二姐推荐，还让他对老首长杨得志将军发过功。我也看了三妹和杨将军练气功的照片，那老将军头上果然也有一个光圈，使我惊叹不已。三妹说她还练了种“香功”，说是发功后能发出桂花或茉莉等的香味，有回她用双手揉搓一通让我闻，问我闻到了什么味，可我这人一向“顽固”，从来不信鬼不信神也不信什么气功，吸起鼻子闻了又闻，除了她自己的味道，别的什么也闻不出，气得三妹骂我真是木头。不过她的气功师傅确曾在她家住过。

三妹向我说起这事时，臭骂那个“老混蛋”首长，伙同自己手下的人对她栽赃陷害，诬蔑她与气功师有什么不正当关系。她说那气功师与二姐和她隔着一个辈分，他才三、四十岁，二姐和她已五、六十岁了，那师傅平时都叫她们阿姨，两辈人能有什么事？我听了却在心里想道，当今社会上什么事都有，不是一辈人甚至是同宗者，一起胡来和上床的事不少，隔辈并非不可逾越的界限，不是同姓同宗的人就更难说了。当然这话我只能暗自想着，绝对不能说出口，更不能帮着三妹的“敌人”说话。

三妹这场官司打得很久，搞得她筋疲力尽又几乎“身败名裂”，二姐和我们对此都爱莫能助，只能从旁给予感情支持，也痛骂那“老混蛋”几句。三妹又告诉我，她“竞选”总政

文化部长之事，也是被那“老家伙”搞黄的，他说自己正“竞选”总政主任或副主任，三妹如也当上总政文化部长，夫妇二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，上头肯定通不过，只能确保一方，要三妹服从“大局”，牺牲自己让他先上。所以三妹说，不是那“老混蛋”捣乱，她完全可以“更上一层楼”，可惜大好机会白白断送了，不过他的目的也未达到。我听了在心里暗道，常言道“一山难容二虎”，他们一家怎能同时出一男一女两个野心家呢？其结果自然要发生火并导致两败俱伤。命中注定，他们这对“政治夫妻”，肯定不能白头偕老，却没想到最后竟是这样互相撕破脸皮，以致闹得不共戴天！好在这时我只一旁观战，并未被卷入。不过我在另一件事上，却为三妹出了大力，只是最后也没成功，就如她想当总政文化部长一样，也落得个黄粱美梦一场空，反而为人留下了笑柄。

### 三妹又一好事也功亏一篑

这事发生在 1988 年，全军第二次评衔授衔前后。

按照当年的评衔条例，凡是抗战时期参军的师职干部，都可以授予将军军衔，三妹就是 1945 年 7 月，即抗战胜利前个把月时到部队的，现在又是正师职务，完全合乎当少将的条件。只是她当时年纪太小，不知咋搞的将参军时间一直填为 1947 年，这就过了杠杠。她找我商量，怎么把她的参军时间改正过来，我根据以往经验，说只要能找到她何年何月参军的证明人，证实她确是一个“抗战干部”，还是可以当上将军的。80 年代原新四军四师的老同志还有不少人在，她就去找了一些同志为她写了证明，我又为她找到原四师宣传部长，后来的《解放军报》总编辑赵易亚，作为当年拂晓剧团的直属领导，为她作了更有分量的证明。各种证明凑齐以后，她说还可以找一个更权威的证明，就是原新四军四师张爱萍师长。老师长也真的为她作了亲笔批示，哪知这位老领导对其老部下关心过度，反而帮了倒忙。原来他批示道：我记得你到部队的时间更早，早在 1939 年你就和父母一起到部队来了，因此你的参军时间应该从 1939 年算起。张老将军的记忆一点不错，三妹的父母确于 1939 年到部队，当时确曾带着三妹，只是那时她才两岁，是由父母抱着来的，后来父母又奉命回地方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，老师长一直记得这事。但是张老将军把她的参军时间提前到更早的 1939 年，反而造成了一个军中笑话，某某人才两岁，还抱在大人手里就算作革命历史了！于是这位只有两岁的“将军”也就吹了。三妹白折腾了一番，鸡飞蛋打一场空，反而为人提供了笑柄。其实这事不能怪她，她确是 1945 年 7 月参军的，当时她已 9 岁，虽然只跟在剧团后头，却是个真正的红小鬼出身的抗日干部，可惜这一切最后因为她又去找老师长，反而把好事给搅黄了，连我都为她深深感到遗憾。

从三妹与我的交往看来，她对我还是不错的，她个人凡有大事要事，必来找我商讨策划，我也帮她出过不少主意，甚至捉刀代笔为她起草文稿信函之类，不过我心里一直很有数，我在她眼里只是可以利用者之一，甚至是她的临时候补亲信之一，所以她需要你时似乎十分亲密，反之则扔在一边，你要也有什么事，她是不会也不想管的，凡是与她相处过的人，对此都深有体会，所以我从不找她为我办什么事。但是出于与她一家特别是二姐的长期友谊，我还是乐意为她们效劳的，不过有时我也有反抗。例如后来我也到了参政，与她共事办公时，要讨论什么文件，她懒得自己一字字看，就嗲兮兮娇滴滴地对我说，你给我念念吧！我却把文件朝她一推道，凭什么让我给你念？我年龄比你大，资格也比你老，不是你手下的小干事，你更不是伟大领袖，要别人为你念文件，还是自己看吧。她只得横我一眼，笑笑拉倒。有时我们一起参加什么活动，每逢集体合影留念，她当仁不让，和一些高级首长在前排中间就座，从来不招呼我坐过去，我就无所谓地站到后排，又常故意避开不参加照相，不想与她平起平坐，更不想也争点什么，只是在办事时是认真的，真心实意地愿助她一臂之力。

其实我一直很明白，尽管三妹似乎很得意很风光，雄心（更是野心）也很大，其实并不

得意。她曾大言不惭地对我说，别人能上，我为什么不能，老娘（！）不比别人差！又沾沾自喜地说，有人说我是“撒切尔夫人”，我就是个“铁娘子”。但我心里却认为，你算了吧，别“癞宝爬戥盘——自称自”了，你有多大能耐，多高水平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底吗？你为争这么点功名利禄，天天勾心斗角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活得累不累呀？而且我早已看出，她从仕途到个人生活，其实也都不顺，凡事都不称心，且不说她结了婚又离婚，离了又再结，现在又要离，并且在法庭上当众“大打出手”，就说她最后的最高职务，也就是个参政文化部长，与我同级的正师干部，可我是论资排辈自然到手的，她却是拼拼杀杀挤挤撞撞地争来的。眼看着别的资历不如她，年龄也比她小的人，呼呼地跑到她前头，爬到她上头，她怎么也于心不甘，从心里到眼里无不充满了醋意。我见她眼圈总是泛黑，面色也较苍白，虽然她不缺营养，也不少化妆，但却过于劳累，特别是心理负担太重了，她争来的这个官，还有什么“女子军乐团名誉团长”之类虚名，付出的却是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力以及生活的乐趣，别人是有失有得，她却是得不偿失，甚至赔了老本。所以和她在一起时，常听人吹她捧她，我却总是暗暗地同情、惋惜并体谅着她，谁叫我是她们姐妹的多年老友呢？

## 美丽二姐的凄凉晚景

说起她们姐妹，二姐更是个悲剧人物。她因为出众之美成了首长夫人，不幸也就由此开始：先失去了自己多才也多情的恋人，又失去了可贵的青春，得到的却是无情无爱的虚浮生活及其虚名。前已说过，她和自己的早年恋人幽会过，又被伟大领袖“宠幸”过，在丈夫即我那老军长眼里，早已是个对他不忠自身不洁之人，加之看透玩腻又人老珠黄，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。而且这位首长，为人一直很“花”，经常拈花惹草，60年代已经升到上海警备区副司令，有一回紧张备战时，竟找不到这位首长，后来查出他出去找女人跳舞了，为此丢了到手的副兵团级待遇，被贬到安徽省军区当了个第几政委。他在解放初期就是军长，同级的干部以及自己的下级，都已一一升了上去，他不仅原地不动，实际上还下降了，他是为了美人丢了“江山”。可能正是为此，他常拿已不再是美人的妻子出气，家庭生活长期不和。后来他从安徽平调到江苏，又当了几年的省军区第几政委，最后又从南京军区顾问虚位上退了下来。无官一身轻了，他索性自由自在地连家也不回，不断在各地游荡，回到南京也住进军区医院，就是不回自家，把二姐晾在一边，甚至把警卫员、公务员和炊事员等等，都弄出来只为他服务，不管也根本不理自己夫人的生活以至生死，从精神上孤立和折磨她。这使二姐极其苦恼，有一年她到北京来，向我哭诉了我那老首长对她多年的摧残虐待，说自己早已无法忍受了，打定主意要离婚。我努力安慰她，又和别的熟悉她的战友商量了，一致认为她如真的离婚，反而得不偿失，几十年过惯了首长夫人生活，一旦退出豪门，失去优厚待遇，生活将一落千丈，她已进入晚年，这日子过得下去吗？别人也劝她还是别离婚，真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不离至少还有个名分，该什么待遇有什么待遇，除了老头子，别人也不能怎么着你，你就不离婚，又可以干耗着老头子，不然说不定等于给别人自动让位，老头子马上名正言顺地再娶个比她更年轻的，自己是白白地帮别人忙了。她听听也觉有理，默默地接受了。我记不得因为什么，二姐这次来京没有住在三妹家，却住到一个战友家里。我那时正因后妻很少到我这来，家里就我一人，就请她住到我这来，她看了看我那光棍汉似的家，迟疑地说，孤男寡女的，就我们两个，住在一起行吗？我这才想起，自己一直真把她当姐姐了，其实她比我大不多点，并且风姿犹存，我又是一贯很欣赏她，是应该避避嫌，不然就说不清楚了。

二姐说来真是不幸。在安徽时，家里没有暖气，冬天洗澡在浴室生了个木炭火盆，一个女儿洗着洗着，就被煤气熏死了，当时才十多岁，使二姐十分伤心。有个儿子长大了，老军长走后门让他参了军，还是坦克兵，那小子不知为什么忽然携枪逃跑了，据说偷越国界时被抓住，作为“带枪叛逃者”，被判了徒刑，老军长再走后门，将他提前释放，因为是个刑期

未了的犯人，哪里也不能安他，只得长期东游西荡鬼混着。这一儿一女的厄运，当然使当妈的二姐心力交瘁痛苦不堪。虽然还有孩子，但都只躺在老爸树下乘凉，对这老妈不大在乎。后来我们那老军长去世了，我到南京去看望了已成遗孀的二姐，使我大为意外的是，她刚到古稀之年，却已衰老得惨不忍睹，整个人全变了形，说是中了风，嘴角不断流着口水，话都说不清楚了，还抖抖索索地。儿女都飞走了，家里整天就她一个人呆着，一边开着电视，一边闭眼歪在沙发上，整个一副等死的架势！且不说当年出众的美貌，就是若干年前练气功时的样子，竟都毫无痕迹了！

当年的美人，我们亲爱的二姐，上哪儿去了？

我见她时心痛极了，以后再去南京，明知她很孤独，需要人关心帮助，我却不敢再去看她，只在心里时时惦念着，想象着她现在的惨象，每逢看到见过她的人，都仔细打听她的详情近况。

### 三妹成了“孤家寡人”

三妹的晚景并不比二姐好。

在她与第二任老公打离婚的同时，已经发现了淋巴瘤等多种病变，以后的日子不是住在医院，就是出来打官司。离婚官司使她焦头烂额，癌细胞也迅速转移并日益扩散了。也许是心病引起了身病，或是身病加重了心病，使她五内俱焚，以致加速了生命的终结。

不过三妹从来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，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使自己扬名出风头的机会。她离休以后竟又筹建开了什么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、中国妇女文化促进会，特别是什么毛泽东文化艺术研究会和毛泽东书法研究会，并且自任会长，一面煞有介事忙忙叨叨，一面拖着病躯东奔西走。

在她最后几年居然也办成了一件“大事”。不知她从什么时候起，描摹仿写开了毛泽东书法，还写出了一大堆，又为此办了个展览。我对此一直不以为然，曾说她是个没有文化的文化部长，哪懂得什么书法，还办什么书法展览，就没有关心这事，也没有去看她的书法展览，只从小报上看到有关的消息。有篇吹捧文章写道：“毛体”（书法）在中国只有两个人得其真传，且都是女性，一个是江青，一个是李×，很显然，这与毛泽东的亲传是分不开的。这话说得既含蓄又露骨，就欠赞她是毛的又一个“第一夫人”了。有的看过展览的人，说在作者介绍中将她写成长期“在毛主席身边工作”，知道内情者就说，她确是在毛主席“身边”，只是到底干什么“工作”，就不好说了。由她自任“会长”的“毛体书法”研究会，任命二姐那个无业儿子为“秘书长”，在姨、侄二人到处活动和张罗操持下，这个展览除在北京展出，又先后办到了南京、徐州、济南甚至广州等地，不只使她又大过了一把瘾，更以此炫耀了她与伟大领袖的不一般关系。我虽然不懂书法，只看过她几件作品，也感到仅仅是形似而已，要达到老人家书法的奔放俊逸和挥洒自如，又谈何容易？她不仅没有这个功力，也根本没有这个功夫，这时她既要治病又要打官司，哪里还有多少精力、时间呢？不过这事确成了她此生最后一个辉煌，虽然大大风光了一阵，却又大大加速了生命的终结。

我离休后同三妹住在一个干休所。据说她早晨参加院内老干部舞剑等活动，总是带着小保姆为她抱剑，人们就说她是个带“丫环”的女“贵族”，其实她早已既不“贵”更无“族”，只是一个不甘沉沦的离休干部，并在努力撑着一副架子。有次我和妻子一起去拜访她，又邀请她也来我家坐坐，我们三人是漫步来我家的，她坐了一会竟打电话回去，让女婿开车来接，其实从我家到她家，至多只有二、三百米远，可她就要摆这个谱，但也可能由于身体损耗太多，体力确已不支，实在走不了这点路了。此前我每次见她，都听她没完没了地骂那“老流氓”、“老混蛋”，就如祥林嫂见人就说她的毛毛一样，不免有点厌烦，也就很少上她家去。后来大院里通报了一事，说她家被盗了，并且损失不小，我见到她问了此事，她懊丧地说，

是有人请她出去吃饭时，不在意没锁好门，被贼钻了空子。后来检查只丢了一些现款和存单、首饰之类，总共约有五、六万元，她说自己多年的积蓄全完了！我却庆幸她那批无价国宝文物，没有被人发现更未丢失，也许是那贼人根本不识货。

她最后几年内，二姐的儿子即她的“秘书长”常住她家，在总参三部的儿子、女婿也常回家住，另有小保姆伺候着，只是在院里几乎从不见她，也不再参加干休所的各种活动，不是在住院，就是又出去办书法展了。我妻子有一次看到她，见她瘦得已经变了形，哪知她竟很快“走”了！

2003年7月，我接到关于她病逝的电话，马上去了她家，见她女儿在，精神极其颓丧。三妹是7月8日“走”的，享年只66岁，如今常说“八十、九十不稀奇，七十才是小弟弟”，三妹还不到“小弟弟”的岁数，就寿限已尽了！我安慰了她女儿，问有什么后事我可以帮着办，她说已有干休所在办了。到告别仪式时，我和妻都去了，她的前夫、我的“铁哥们”也到了，只是守在遗体旁的亲属只有女儿一个（也离了婚且没有子女）。儿子是由母亲安排到深圳工作的，早已下了海，由于父母离异，一直未再回家，与父母也无联系，近年竟完全失踪了，任何电话、地址都没有，母亲去世了，竟通知不到他。已离婚的前女婿看了于心不忍，主动上去陪前妻一起站着，他要拉我的“铁哥们”一起去，说是他们二人的身份其实是一样的。“铁哥们”却不干，说我站那儿算什么？二姐在南京又在病中，自然来不了，哥哥正在上海没能赶来，大姐倒在北京，也因多病没有来，不知为什么连二姐的儿子，即三妹的“秘书长”也没到，这使多年风光的三妹，最后竟成为“孤家寡人”，从逝前到身后，都孤独凄凉，她的一生，“功名”以至“辉煌”，从此灰飞烟灭毫无踪影了！

## 如此一生

以上所记大都出自本人记忆，其中当然也并非事事亲历亲见，有的也是听说的，特别是关于三妹、二姐和伟大领袖的事。不过这也有书为证，如《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》台北版第342至343页，第346至348页，就有关于“毛另一个‘女友’是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团员”的记载，书中写到的事我又另有旁证，决不敢对她们更不敢对伟大领袖“造谣诬蔑”。不过在一份小报上却登了另一说法，有篇短文竟说因为三妹是烈士的女儿，毛主席在“亲切接见”她时说：“杨开慧是烈士，你母亲也是烈士，你姓李，我也姓（过）李，你就做我们的女儿吧！”并且将她与毛的两个亲生女儿李敏、李讷并提。但是文中对于她和毛“父女”间的那种事却一字未提（事实上凡在国内已经公开发表的，都一律不能也不准提），只讲了毛如何关心帮助她，让她好好读书学文化，还几次“资助”她寄钱给自己的父亲等等，这些事我的“铁哥们”，她的前夫也可作证。此文又把三妹吹成“共和国军内外第一位女部长”，在《国际名人录》上被誉为“英雄气概美人风度”的“东方才女”。此说肯定是夸张虚浮不实之词，因为这种“名人录”中的文字，都是由“名人”自己提供甚至自己写的，其“名人”资格花些钱就能买到，因此小报上那篇短文的素材，看来也是三妹自己提供的，她自己一直追求、迷恋和陶醉于这种“美誉”。

大概也就因为三妹当了这种“名人”，2004年3月她的老家江苏邳县派人来北京，说是县里正在筹建“名人馆”，三妹名列其中，特来搜集她的资料及其文物。来人也找到了我，我应约介绍了她的部分可以公开的情况，也介绍了她的二姐和哥哥的简要情况，又建议他们好好搜集了解关于她们烈士母亲的事迹和史料，我认为应该大力宣扬这样的革命先烈。但是来人对此似乎并无兴趣，原因是其母不是名人，更没当过什么“长”，他们只注重三妹这样的所谓“共和国第一女部长”，我对此也只能摇头叹惜。我知道三妹是挺有“名”，不过只是因为她曾“在毛主席身边工作”过，而这个“工作”偏偏是说不清道不明上不了台面更见不得人的，所以对她的介绍只能“掩其一点，只吹其余”，这种半假不真的粉饰改扮出的“名



人”，不知有何值得崇敬之处？

到我写作此文时，三妹已经“走”了一年多，她的二姐、大姐和哥哥虽已不“健”却还仍“在”。倒是被三妹“休”了的前夫，即我的“铁哥们”画家，活得十分健康甚至自得其乐，他离开三妹后，一直埋头作画，因为没有再婚，儿子又不在身边，一人独往独来，过得倒也潇洒。因为此文涉及他和三妹等人的隐私，我只得一律不提本名，只述其事，以保留我党我军我国的这段“历史的真实”，文中写到的各位，各自都有过一段辉煌，如今却早已成为过去，一切都已划了句号。

三妹晚年虽不如愿，却也捞到点虚名，又位列县里的“名人馆”，还上过什么“名人录”，大概也可“死而瞑目”了。只是我在回顾她和二姐等的一生时，心中又充满了惆怅与惋惜，他们这样度过一生，值吗？

2004年8月6日——13草于北戴河，24日——29抄改于北京

## 讣告

为《往事》题写刊头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原北京市地安门中学历史教师张茂松先生，因病于2007年6月29日17时10分不幸逝世，享年七十一岁。张茂松老师是《往事》的热心读者和积极支持者，我们对他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。

编者